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七〇期 ——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1 0 a）

【史海钩沉】郑思群之死和重庆的8 1 5运动	周孜仁
从浩然误记“军宣队”说起	司传人
【往事追忆】文革：洞派的回忆	江 南
我见到了毛主席	田壮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郑思群之死和重庆的8 1 5运动
• 周孜仁 •

郑思群，广东潮汕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中共，曾任著名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秘书，抗战期间在延安任“抗大”某分校教务长，解放后则一直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行政七级干部。

1966年6月21日，郑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重庆市委正式点名批判，市委工作组在对其进行了多次内部批判围攻之后，于7月19日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时值山城酷暑，路地焦烫灼人，据目睹现场的同学说，老头乱发覆额，形容憔悴，被人押解赤足而行。10天后，即7月30日，工作组公布郑的“十大罪状”，正式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再3日后，即8月2日凌晨5时，郑在监护地用半片剃须刀割喉自尽，颈动脉血喷如注，将白墙壁涂染得鲜红狼籍。事发，工作组草

草验尸、清洗现场并火化，次日，即8月3日，重庆市委宣布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将其开除党籍。是日晚，工作组紧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市委副书记鲁大东亲自到场宣布该决定并强令师生批判之。

第二天，校园内就出现了大字报，质疑市委并公然为郑思群鸣不平。嚣声既起，重大校园里压抑已久的敌视市委的情绪便如火之燎原、水之决堤，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

又11天，即8月15日，重庆大学便爆发了轰动全川的“815事件”，并由此而在云诡波谲的四川文革舞台演绎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闹剧。

1966年的中国夏天是令人激动又让人心悸的。数不清的“红卫兵”、“造反派”因为反对校领导、因为打倒老师和“学术权威”而在全国各个角落呼啸而出。而为一个冤死的大学校长鸣不平并起而造反，重庆大学的“815行动”大约是一个特例。笔者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以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记下来。

郑思群之死是815事件的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初期，重庆市委及西南局要将郑思群无端揪出来批判打倒，这件事，在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对政治游戏的秘诀已捻熟于心的中国人来说，应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其势汹汹，要打倒这样打倒那样，西南局和重庆市委不揪一两个“黑帮”出来批判打倒，何以交差？再说，据知情人事后介绍，郑思群孤高自傲，很不合群，且又在无碍政局的教育部门为官，干掉他确实轻而易举。郑自然就成了被抛出来作政治牺牲品的最佳人选。遗憾的是，1966年重庆大学的热血学生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对共产党崇拜备至，对共产党的干部崇拜备至：尤其郑思群。郑平时不苟言笑，身材瘦而高，满额皱纹记录着令年轻人羡慕不已的光荣历史，简直就是活脱脱一位典型的革命家形像。

而这位近乎神样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偏偏对年轻娃娃平易得异乎寻常，他从不摆架子，不骂人。上课时，同学们会看见他悄悄坐在后排听讲，有时还掏出手绢擦拭玻璃窗上的灰尘。到食堂巡视，他甚至当着学生的面，把掉在桶边的饭粒从地上捡起来吃掉。电机系67级有位同学叫郑志胜，家穷没钱买鞋，就赤脚上课，正好遇上校长了。是在五教学楼阶梯上。校长问他为何不穿鞋？问他在哪个系？哪个班？第二天，象奇迹一样，一个十分和蔼的陌生人便来到郑志胜的寝室，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他很快知道了，这位陌生的送鞋人，就是校长秘书。文革中，郑志胜因多起血案牵连而被监禁十余年，出狱后两鬓斑白，万念俱灰。我曾问他：当年，你何以要如此铁心死保郑思群？如此狠心毒打工作组组长余跃泽？并最后参加815造反？他眼神木纳，沉思良久，极其认真地回答：“就为了那一双鞋呀！”

郑思群在少不更事的娃娃心目中既然创造了如此形像，他的冤枉和屈死对大学生的神经中枢将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刺激和反应，就不足为怪了。

◇ 从617到619

重庆大学的文革和全国同步。从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为发端，全校“停课闹革命”，半月多混乱愈演愈烈。6月17日这天黄昏，正当学生们在校园里热热闹闹张贴大字报，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和与之对应的本校文化工作主管：校党委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学生三宿舍门前突然出现了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该大字报在提出几个捕风捉影的疑问之后断然宣布：《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文章既出，很快便被惊诧万分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而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余国华，趁机跳上三舍前一棵榕树的石台上大发演讲，重复大字报上那几条的捕风捉影的疑问，反复号召大家对郑思群黑帮，要“狠狠地打！狠狠地打！”余毕业后分配四川乐山大渡河钢厂，后官至该市市长、四川省经委主任。据和他共过事的同学说，几十年宦宦生涯，权力所及，他对校友们很够义气的，包括反对过他的同学。他说话舌头有点大，口齿不清，笔者当时挤在外围，只听见他不停地喊叫：“狠狠地假！狠狠地假！”这份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虽然纯系空穴来风，但事情发生在全校学生均处于群体无意识的背景下，其煽动效果却是很可观的。那一夜，整个学校被搅翻了天。有人认为，既然校长都是黑帮，整个学校岂不己危若垒卵？于是一群一党地冲到学校武装部，要夺取枪支保卫学校；动力系食堂门前，学生们扛出饭桌搭成高台，笔者去时，正好看见该系67届学生周兴福站在台上痛心疾首地发表演讲，他反复号召：“同学们哪！大家快回到自己的系班去呀！你们看这么乱糟糟的！怎么搞文化革命呀！”那动作和口气，很容易让人想起抗日时期北平的救亡青年（周为人处事颇多热情且多谨慎，曾任《815战报》主编数月，毕业后曾因此而险遭算计，最后有惊无险。担纲四川省火电建设二公司总经理，工作成绩一直斐然业内）。机械系二年级七个学生还连夜徒步进城，要求市委书记任白戈接见。那天晚上重庆大学真正的舆论热点是余国华所在学生五宿舍。几乎各系各班都有学生涌到他房间要求公布郑思群黑帮的确切材料，人太多，以致该宿舍的学生不得不派人举着棍棒把守大门，问明来人身份和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党员或者团员）方可放行。

文革开始以来，这个第一次把校园搅得如此热闹的事件，叫做“617事件”。事件本身很快就露出了许多破绽：617当晚，余国华就被前来走访的同学追问得无以对答，只能无可奈何地搪塞道：四十八小时之内，保证向大家公布郑“黑帮”的“钢鞭材料”。其次，有人发现，大字报的五个作者，全是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的干部。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篇大字报的出现，是不是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金蝉脱壳”，为保护自己而让余国华等人写这张大字报以将祸水他引？

最先提出疑问的恰恰是余国华的中学同学、后来815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吴庆举。吴系机械系67级学生、时任校文工团乐队队长。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非常重视文体工作，故而让各系各班的文工团员和体育队员全部集中居住。那时候学校内部交流很少、消息闭塞，文工团员和体育队员的集中居住从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可能：将全校的信息在这儿迅速集中并加以发散。重庆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多出在文工团和体育队，就顺理成章了。（除了文工团的吴庆举，后来成为815总头目的周家喻，是羽毛球队的队长）6月17日晚，吴庆举到冶金系宿舍质询余国华回来已是深夜。当时我在文工团美术队任队长，住吴的隔壁。吴满面红潮地找到我，非常冲动地说，该大字报明显是个大阴谋。他说余绝对没有任何资料，等到四十八小时拿不出东西，我们必须起而揭露之。当天晚上，便由我执笔，起草好了一篇大字

报，题目是：《千万，千万，千万警惕更大的阴谋》。

对于吴庆举和我，6月18日是很难熬的一天。我们跃跃欲试，急于向全校同学公布我们的新发现，可我们又必须等待48小时的到来。更要命的是：余国华的大字报事实上已经把晕眩中的大学生的革命歇斯底里触发起来，困惑而激动的年轻人整日价都惶惶串联，整个学校躁动不安。月初，市委曾派有一象征性的工作组进校“协助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18日中午，为稳定局势，市委急忙宣布直接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此举顿时让舆论大哗。是日晚，无线电系学生在一教学楼前自发集会，宣布校党委和工作组都是黑帮，必须通通打倒、赶走，由学生自己闹革命。大会派人去邮局及当地驻军7788部队联系向北京发电，请求中央直接派工作组来校，均遭发电人拒绝，于是连夜在校内进行示威游行，汹涌澎湃几至天明乃止。

那一晚，我、吴以及文工团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学生也通宵未眠。我们看见无线电系的同学在宿舍外喧嚣而过，心情极其复杂紧张。余国华承诺的48小时早已过去，他的“钢鞭材料”显然是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目前这种气氛下贴出为郑开脱的大字报，显然是逆流而动，其结果会不会和余国华本人一样，遭致全校同学的反对甚至于围攻呢？年轻人的偏执和自尊使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求有更多人和我们共担风险。游行队伍过去，我们马上拿着那份“警惕更大阴谋”的大字报征集签名，开始，只在文工团内部秘密进行，后来，美术队队员代玉松（现四川理工大学教授）自告奋勇，主动回到他所在的电机系宿舍挨户敲门，象地下工作者一样宣传观点，征集签名。代为人忠厚本份，不善言辞，但那一晚，他很快给我们征集到几十个同盟者，使我们对他都刮目相看，也使我们信心大增。天将破晓，我们壮着胆将大字报贴上一块木板，然后横架于九舍和二、三舍之间的路的正中：这是学生们吃早餐必经之地。我们便躲在房内窥视动静。不久曙色放明，打早餐的同学果然很快聚集在木板前叽叽咋咋，不少人还当场取出钢笔批注：“坚决支持你们的观点！”“我们受骗了！”“找余国华算帐去！”

我们于是以胜利者的身份从宿舍里走到了大字报前，得意洋洋地公开自己的观点。

整个学校局面又转向了。被嘲弄了的同学们于是纷纷走访余——这间斗室又成了新闻热点。不过，余国华却逃遁了。若干年后，吴告诉我，余是他帮助藏匿的，地点是废弃的校办钢厂的楼上。余的室友无法招架纷至沓来的质询者，睡觉时候也不得不在自己的身上盖一张纸，上书：我不是余国华，请不要叫醒我！既然大家已经认同倒郑事件是宣传部和校团委合谋的一桩诡计，水落石出，顺理成章的结果当然是大家回过头来，继续对邓时泽和刘稚民进行革命大批判。当时我刚好以优异成绩作完毕业设计，心中曾经窃想：这下好了，等到邓、刘倒台，重大的文革就该胜利结束，我们也就该桃飞李散，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岗位去报效祖国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十年动乱才刚刚开始呢！

市委想借刀杀人 没想到反而引火烧了自身

6 1 7 和 6 1 8，都有同学找市委上访。笔者不知当局意图，但，如果本文开始提出的假设成立（即西南局和重庆市委想趁机翦除异己，同时也向中央交差），那么，这个时候对郑思群动手，应该是水到渠成了。于是在 1 9 6 6 年 6 月 2 1 日，《重庆日报》头版头条正式刊登了重庆市委关于让郑思群停职检查并派工作组进驻重大的决定。2 2 日，市委副书记辛易之亲率以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的高规格工作组开赴重大。2 3 日全校大会，余踌躇满志地发表演说，声称这次他到重大，就是来支持革命师生，来揪“郑思群黑帮”摸“郑老虎”屁股的。余跃泽在市里分管财贸商业，营养充足，胖，说起话来中气极足，一付志在必得的神情。他当然没想到这儿恰恰成了重庆市委的“滑铁卢”。

6 月 2 1 日以来发生的情况再次把学生们搞懵了。不是才弄明白所谓“郑思群黑帮”是某些人的阴谋吗？为什么市委甚至西南局都跟着起哄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市委工作组下车伊始，什么情况都没有调查，为什么就匆匆忙忙宣布郑思群是“黑帮”，这中间莫非又有什么阴谋？于是，质问《重庆日报》、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再次蜂拥而至。在报纸上表态拥护市委决定的“左派”学生（这些学生后来一直成了工作组倒郑的中坚分子）受到普遍奚落。工作组驻地成了同学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办公室主任孟凡均显然是个精明能干之辈，但每天面对满屋子能言善辩、把毛泽东语录背得滚瓜烂熟的大学生，他除了用一些历史暗示对无知的年轻人进行威胁恫吓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工科学生在工作组大门口贴了一幅对联非常有名：

曲率半径处处相等
摩擦系数点点为零
横批：又圆又滑

工作组一再要求学生们把斗争矛头对准校、系两级领导，而到现在为止，学生们的矛头偏偏对准了市委及其工作组本身了。工作组成竹在胸。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动荡不过是过去某次政治运动的翻版而已，面前这些个跳得很高的糊涂虫，很快就会明白共产党在 1 9 5 7 年使用过的手段：“引蛇出洞”“后发制人”——到时候，他们哭还哭不过来呢。他们抓紧在学生中“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7 月 4 日，余组长召开全校团干部及左派学生的秘密大会，会上，他再次重申必须集中火力对准校系两级干部，同时大义凛然地宣布：重庆市委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书记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经过考验的好班长！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反动的！演讲说到激昂处，他拍案而起，险些把茶杯震翻在地。

余当时肯定确信他的恫吓足以大收奇效。不料中央偏偏马上和他开了个玩笑：在他谈话后的第三天，即 7 月 7 日，《光明日报》的署名“穆欣”的大块文章（题目大约是《“国防文学”是王明机会主义的口号》）发表了，文章在两条注释中明确定义：任白戈是“大黑帮”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毫无疑问，这篇文章对感觉良好的重庆市委不啻是当头棒喝。以后的事实披露，这篇文章下来不久，和任白戈关系极铁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即将其以“海外侨胞”的身份隐匿乡下去了——这是另一个故事。且说在重大校园，该文章无疑是对深受压制的“一小撮右派学生”的极大鼓舞。反郑和反市委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再度出现新的平衡。要想在学生中

大张旗鼓地进行“批郑”既然困难重重，工作组只好在内部抓紧施压，不断组织可靠的“左派”对郑进行轮番围攻。

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老于世故的市委领导和年幼无知的学生娃娃一样，都是一群白痴。真正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他于7月16日在武汉畅游了一番长江之后，于7月18日回到北京，次日便批评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说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其后，毛精力充沛、没日没夜地听汇报、发指示，不断给当时在北京老老实实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施压。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造反，甚至直接写大字报，指责刘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面对咄咄逼人的进攻，刘少奇只有节节败退一法。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毛指示：撤消工作组。刘不得不灰溜溜地在会上承认错误，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革命怎么革？我老老实实回答你们，我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山雨欲来，重庆市委应该有感觉了，他们显然想趁远在西南的学生娃娃还没弄清底细，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工作组打一个完美的句号，然后体体面面打道回府。对郑的迫害开始提速。工作组调兵遣将，新增队员200余，确保每个班均有人严守死守，督师批郑，他们放出风声：“谁还对郑思群抱有幻想，谁就是立场问题！”其时，郑已被押赴松林坡顶原苏联专家招待所看管，日日由左派学生批斗，行前，全身被搜，赤足而行，仅容带《毛选》一册。郑恰恰将半片剃须刀夹带其间，上山了。

7月28日，工作组正式公布《关于郑思群同志的材料（初稿）》的审查材料，发全校革命师生批判。该材料采用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手段为郑罗致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十大罪状”。原来校任教的苏联教授离渝返国，学校按礼节每人赠送校园风景照一册，亦在材料中被认定为郑“里通外国”的间谍铁证，其余“罪状”之荒唐，就可见一斑了。这样的材料不可避免地又在学生中遭到质疑和对抗。

毕竟工作组经营日久，“左派”行道，满校高压，诺大个重大，已经没有人敢发杂音了。高压气氛，至郑的自杀到了顶峰。

郑是8月2日早晨5时自杀的。但学生们十几个小时后才得到消息。正在晚饭，采矿系同学李远旭突然冲门进来，大呼：“郑校长自杀啦！”全室顿然惊骇，继而呆木，继而悲戚万端。同学们停饭叹息，有人还痛哭失声。年深日久，笔者已无法准确记起那一天晚上学校发生的所有细节，而我自己干的一件事情却清晰如昨：同学们都已酣然入睡，我却独个儿愤激难平，伏案急书，匆匆给西南局及书记李井泉写了一封状告重庆市委及工作组的信。信毕已近子夜，我还急急敲醒了邻屋的吴庆举。看完信稿，我满以为他会起而应合，义无反顾的和我从容前行，与工作组血刃相搏。出乎意料，吴非常紧张地把信叠起来，塞还给我，说：“快收起来！快收起来！这样做太危险！”

我无话可说。第二天，我一人上街，把信付了邮。这已是1966年8月3日

的事情。那天校园里特别清静。重庆市委仿照北京规模，在市中心的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毛的指示，还有刘少奇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重大每班选派三人前往。有点暴风雨前的感觉：整个学校都停了摆，很清静。很快，闪电果然挟狂风骤至。开会的代表还没有回来，消息先到学校了。还是李远旭冲进寝室报告的。李，采矿系三年级学生，美术队队员。他是著名的消息灵通人士。《毛主席语录》的第一个手抄本是他传来的，前面说到的余国华大字报也是他最先传来。他的发语词都是“惊人消息！惊人消息！”那时午饭刚过，火炉山城毒日当头，走在水泥地面如行炮烙。我们美术队几位学生憋不住激情如沸，全都光着脚丫就跑到二舍前的马路上写标语，一边铺纸一边写，四句话：“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标语的轰动效应没维持多久。下午开会代表回校，所有谜底便已揭晓，重大的文革故事显然应该翻到新的一页了。只是，固执的市委工作组——拿当时流行的话说——还不想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场莫名其妙的斗争注定还要演下去，而且愈演愈烈。

◇ 8 1 5 事件山雨欲来

8月3日晚，吴庆举非常着急地找到我，问：“你那封信的底稿还在吗？”我说在。他说行：“时机成熟了。抄成大字报，公布出去！”大字报题目是：《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由吴和我联合署名。文章张贴出去已过熄灯时分。学生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兴致勃勃地用手电筒照看、议论。几十个黄色光影在大字报上你追我逐，刹是热闹。第二天一早起床，二舍和九舍之间的路边已一字儿排开体育队好几份杀气腾腾的响应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我还记得清楚：“我们要怒吼一声：郑思群事件必须重审！”接下来，各系各班的大字报也如潮再起，直扑工作组。市委马上还以颜色。当晚，工作组紧急召开全校声讨大会，由市委代书记鲁大东代表市委宣布开除郑思群党籍，接下来将所有学生领回各自班级强行表态。同时连夜组织“左派”写拥护市委决定的大字报。

这些努力已属徒劳，无非再给大学生对失败者的嘲笑增添一些笑柄而已。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在工作组驻地来几张漫画、几副对联或者打油诗，不满足于把余跃泽、孟凡均弄出来围攻挖苦一通。有好事者从松林坡现场侦察回来，突然暴出一大堆只有福尔摩斯才能够解答的疑团，推论是：郑思群不是自杀，而是他杀！罪魁祸首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工作组！

于是同学们纷纷涌向松林坡，在专家招待所附近的墙壁、草坪和石阶上到处查找疑点，有人爬上围墙，说是发现了血迹，于是把长满青苔的砖头撬回去，用报纸小心翼翼包好，准备送北京交党中央备查。为保护自杀现场，同学们完全不经意地便形成了某种组织，松林坡成了全校的政治中心。许多人自觉地昼夜轮流值守，有的负责与市委、市公安局进行交涉，有的则做些筹款工作以备不时之需。这个行动的领头羊，就是吴庆举。吴后来成为8 1 5事件的发起人，算是水到渠成了。那几天，随时都会从松林坡上传下些耸人听闻的新进展，每一条新消息都足以把重庆市委确定为刽子手。工作组虽然根据市委指示还在重大赖着不走，但对于学生们日复一日浪潮似的猖狂进攻，完全一筹莫展。

这儿，笔者要补充一件几十年一直沉积于心的往事。正是大伙儿在松林坡钻头

觅缝搜索工作组实施谋杀计划的蛛丝马迹时，8日下午，我和采矿系学生蔡增其秘密潜去市委党校走访了郑的夫人、该校副校长吴耕书。吴听说重大学生，便称病不见，而我们则坚持不见不走——最后，她妥协了，让秘书把我们领进了她的办公室。吴非常谨慎地把门窗严闭，这才开始同我们对话。我首先出示了郑思群“十大罪状”的抄写件并自报家门，迫不及待地说明我们的观点及同学们保郑的凛凛决心。年轻人的幼稚和真诚显然把老太太征服了，那天下午，她公然簌簌地向两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说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话。这些话如被告发，她的政治前途将十分可怕。

我们当然希望她能证实他的丈夫死于谋杀，因为在工作组公布的材料中曾提到：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前，曾让他们夫妻有过一夜团聚。而8月2日上午，工作组通知吴回校告别丈夫遗体，却被吴明确拒绝。我们以为，老太太对郑的死因一定有足够的判断依据。不料老太太非常肯定地对回答，听工作组通知说郑自杀身亡，她就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杀了。”她说。这个武断的结论使我们大失所望。不用再追问，她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和郑诀别那一夜，他俩都彻夜未眠。郑对她发了很多牢骚。郑说他把政治看透了。郑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战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我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还说了苏联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和其它一些共产党史上让人齿寒的、我们这两个刚刚走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听闻或不曾听闻的故事。末了，她劝我们：你们还年轻，政治斗争复杂得很呢！你们就少过问吧。那些日子，大学生目空一切，头脑发热，以天下事为己任，可面对老太太消极厌世的教导，竟无话可说。我和蔡相约：为了保护老太太，也不至于给学校里对工作组的斗争带来影响，我们把对吴耕书的访问以及她的谈话瞒下来——一瞒就瞒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们自己都已年迈。

事实上，运动到了那一步，郑是自杀还是谋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反正仇恨已被激化，狂热已被点燃，动乱已如流水下滩，不可阻挡。8月8日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广播里宣布，校园一片欢呼。更大的动乱正式开始了。原来，市委曾通知工作组于8月5日晚24时撤除，后不知何故又宣布无休止延期，只是将办公地从党委小楼撤到七教学楼，致使七教楼又遭到学生们好些天的奚落和围攻。十六条公布当天下午4时，工作组却悄然遁走，撤了个精光，学校顿时成了真空。学生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和自由。他们可以大闹天宫了。

清华附中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论”“再论”“三论”的传单在校园里四处挥洒，造反歌大行其道。批判邓时泽和刘稚民的文章当然要继续做下去，只是他们已经毫无还手之力。更重要的是，欺负学生近两月时间的工作组及其后台：重庆市委，他们有那么多极具刺激性的事情等待学生们去凑热闹哩。而要解决市委的问题，单单靠重大一个学校显然不行。于是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彻夜游行时提出过的命题重新被提出来，那就是：杀出校门，打向社会！毛泽东不是教导过吗：青年学生不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只会一事无成。

8月12日晚上，已经初尝领袖滋味的吴庆举又找到我，商量到外校串连的事。重庆的大专院校，离重大最近的是建工学院，当然该第一个去串联。于是定下来，让我连夜起草一份大字报。大字报摘要如下：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多么幸福，多么振奋啊！

我们最最敬爱的党中央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首都会见了革命群众……这一切啊，怎么不叫人欣喜万分，热泪横溢，斗志高昂！让我们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目前，我们学校“万马齐喑”的局面打破了！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同志们站出来了！千万张大字报，象狂暴的旋风、怒吼的排炮，在揪出学校牛鬼蛇神，深入揭发校系两级的同时，对于以余跃泽为首的市委工作组一月多来的许许多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对于三十年代周扬的积极追随者任白戈在六十年代兜售的大连黑货，对于《重庆日报》1962年纷纷出笼的大批毒草，进行了无情的轰击和严肃的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要革命！！要造反！！那就顾不上几个坛坛罐罐。老一辈打天下，抛头颅，洒热血，咱今天为无产阶级保江山，就要敢于迎困难、担风险！有毛主席领路，有共产党撑腰，还怕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力量。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面前，他们越抵抗，他们就只能完蛋得更快！失败得更惨！是革命的海燕就要敢于顶风冒雨展翅高飞！是孬种，是混蛋，就钻进你那个人主义的蜗壳里去吧！……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高职务，多大的权威，多老的资格，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批判！都要打倒！！毫不留情！！一个都不例外！！！！

……让我们永远永远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稿子拟好，又让文工团戏剧队毛笔字写得最棒的刘锡玉正楷抄好。题目是：“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在群众组织编写的“文革大事记”上，这份公开信曾被吹捧为“轰动山城第一炮”“重庆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来开会游行，有好事者还把它抄得老大，抬在队伍前面开道。8月12日晚上，我们对此全无所想。

第二天吃毕早饭，大字报就由戏剧队、舞蹈队和美术队的一些热心分子拿去铺在三舍门前的路上征集签名。大字报后的空白处签满了，又接一张纸继续签，完了，又继续铺纸。签名的人太多，纸张从三舍门口铺去，一直到民主湖还在继续延伸，足有百米以上，签字的人数很快上升至数千。事前，我们只是打算几十个人到建院把大字报贴上就完事，没想到声势一搞就这么大，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好在，那几年政治活动多如牛毛，开会游行多如牛毛，好些年级的学生还去部队作过为期不短的军训，开展大型活动的纪律准备和道具准备完全没有问题，于是有人提议：

让乐队的同学把铜管乐器统统拿去广场耀武扬威地吹起来！所有签名的人一齐开出去！

这一招真灵！几千学生很快就举着毛的画像和语录牌从四面八方涌来，按系按班整齐有序地排好了队伍，文工团的学生临时又赶写了些“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类的大标语，整个排场就很像一回事了。这就开出去，开进了建工学院的校园。

建院毫不设防，重大学生如入无人之境——确如无人之境：该院的工作组还把学生关羊一样全关在房间里学文件。对这一帮天外来客般的不速之徒，循规蹈矩的学生只敢把头伸出窗外去偷窥片刻，作一番无奈的感叹。重大学生在兄弟学院顺顺当当走了一圈，只在建院广场草草举行个仪式，自拉自唱地把公开信念一通，便得意洋洋地打道回府了。回得重大，余兴未尽，顺手捎带又把邓时泽、刘稚民无辜地带一回高帽游一回街侮辱一番，串联行动胜利结束。

这就是所谓的重庆813革命行动，815行动的预演。需要补充的是，事件当天下午，在文工团戏剧队的房间里，由吴庆举召集了一个总结会，各系都派代表参加了。笔者还记得的，体育队有周家喻、冶金系有熊代富、查正礼、电机系有黄顺义：这几个人，后来便成了声名显赫的815战斗团的主要领袖人物。

◇ 815事件记略

813第二日是星期日，闹事之后，正好美美睡上一天。事情当然不可能这样。拿当时林彪的话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813当天晚上，建院一个叫何德林的学生就颤颤巍巍潜来重大对我们表示感谢还要我们帮忙转交告状材料（何现为云南省设计院高工），好像我们这么一闹，就已经升格为党中央代言人。对方寻找地下党一样的急切和巴望使我们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第二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乾脆来了一帮。他们自称是该校惨遭党委压制的两个战斗队“排炮”和“轻骑”的代表，要求我们声援。

我和吴庆举是在九舍门外的地坝里和他们进行座谈的。对方为首的唐忠明是该校中文系学生，口才极好，后来成了该校造反派的一号领袖。座谈会后吴马上把前一天总结会的各系代表约来文工团议事。有813经验，搞这种活动应该是轻车熟路了，很快制定好第二天行动计划，然后便各自回系分头行事。

我的任务是去师专和校当局联络，安排场地茶水诸项事宜。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士，姓名已不详，是师专所谓“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女强人态度强硬，拒不接待，我方挟势凌人，胡搅蛮缠，吵架至深夜，最后不欢而散乃归。回校后接着抄写大字报、印传单，又把那份后来被称为“轰动山城第一炮”的“公开信”抄写一遍，事毕已东方既白。原先估计事情与813不会有何差异，无非游行一通就万事大吉。

怠倦难支，我乾脆卧床恹恹地酣睡起来。

待中午一觉醒来，发现同学一个都没回来，知道出事了。匆匆赶去师专，没进

门，就觉情景不祥。原来，对方既已知道我们将前往闹事，也连夜作好准备。学校大门口的马路上，用石灰水写满杀气腾腾的大标语：“我们不要救世主！”“重大一小撮右派滚回去！”“誓死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云云。校园内更是喧声如沸，混乱非凡。操场中间红旗标语乱摇一片，重大学生窜动其中，歌声吼声雷涌瀑响。场地四周则全站满师专的学生和不知哪儿请来的工人，一派虎视眈眈，冲突随时有一触即发之势。山城八月，气温达38摄氏度。大家在烈日暴晒下对峙数小时而毫无退意，其情势之爆裂，现在想来，尤让人欷歔！

先是，师专曾企图阻止闹事学生入校，可毕竟重大人多势众，阻止不得，只好退守回去，围在操场四周起哄，并多约些工人前来助威。我开我的会，你起你的哄，本也可相安无事，后来就出了一件小事：那时候，双方本来就都想寻事，任何一点火星都足以惹得大火燎原，这小事情自然马上就闹成大冲突了。情况是：操场前面一幢办公楼正在修缮，重大学生就想把毛主席像挂上楼前的脚手架，师专方当然反对，施工工人遂被人驱前阻止，于是冲突在脚手架便开始发生，全场由此大哗而且双方的争辩对骂很快提升到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感情、政治立场的高度。攻击愈演愈盛而显然不可能有结果，党中央太远，只好先找市委断个公道。重大有个摩托队，车不少，行动很机动的，跑了多次，市委领导坚辞不出。事情就一直僵持下来了。这就是我赶去师专时发生的情况。事情一直到晚上，双方学生还不依不饶。已是下班时间，前来看热闹的工人和市民如赶庙会，越聚越多，如果市委不解决，局面将更难收拾。市委副书记辛易之临危受命，硬着头皮来了。重大学生当然要他宣布这是革命行动，师专当局当然要他表态为反革命行动。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市委副书记当时也绝对蒙在鼓里，他能表什么态？装聋作哑顶牛顶了几个小时，顶得重大的学生们实在没耐心了，行动只好无果而终，各自打道回府。

队伍撤回学校已是深夜，而重庆大学却无人入睡。《辛易之是屠杀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打倒重庆市委！》之类的大字报，从那一夜开始，就开始向诺大山城，铺天盖地地蔓延而去。其后十年，重庆再无宁日了。

◇ 两点结论

（一）815作为内地红卫兵运动的一种典型，和北京有明显的不同。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最早几乎都由高干子女（尤其是师大女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校的高干子女）发动，其心理根源首先是封建贵族思想诱发的畸形优越感，如子承父业（即所谓无产阶级江山接班人）、血统高贵等，其次是社会和学校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培养的仇恨心理。这两种心理一旦组合，一有条件，马上就膨胀为破坏性极强的暴力倾向和打倒一切的歇斯底里，动不动就要“滚他妈的蛋”就要“红色恐怖万岁！”就要“砸烂谁的狗头”“抽谁的狗筋”“拔谁的狗皮”；内地的运动则多由大学生发起，理性的东西更多一些。很多资料证明，参加文革的大学生很多都参加过65年66年的农村“四清”运动，对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即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经有相当印象，因此一旦参与文革，虽然不知道毛具体要想搞掉谁，但把矛头对准党内当权者，这一点心理上和行动上都是明白的。到社会上去乱打乱砸的事情，包括残酷折磨迫害无辜教师、平民的事件，相对少得多。

（二）文革发生绝非某一入意志即可所为，也不是单靠学生即可所为，既然是全国全民族的动荡，既然是长达整整十年的动荡，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郑思群和重庆市委的长期不和，风吹草动，便将厮杀，当是815发生的背后原因之一。而据笔者后来几十年漫长岁月所调查的更多资料证明，之所以有那么多工人卷入，那更是因为解放十七年来，官僚阶层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有地方有时候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了。毛泽东既然要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挥手一呼，大曰造反，全国上下，焉会不反？如潘多拉之瓶，既然塞除瓶倾，魔鬼已出，毛泽东自己也很难控制了，耿耿十年，焉能不乱——直至毛本人含恨而逝乃止。

□ 寄自中国

∞ ∞ ∞ ∞ ∞ ∞ ∞ ∞ ∞ ∞

从浩然误记“军宣队”说起

• 司传人 •

作家浩然在回忆录《我的人生》（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一书中，以平实的叙述回忆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独特经历。读后使人增进了对他和那场“大革命”的许多了解，不少地方读来令人感叹。以浩然这样的文革名人来写涉及文革的回忆（特别是在一片沸沸扬扬的“忏悔”、“你为什么不忏悔”的争论声中），是不容易的事。他不但写了，而且还写了自己在文革中“犯错误”的特殊经历和复杂的心路历程，这就更不容易。他的叙述既不要花腔也不打官腔，态度是严肃、真诚、直率的。

不过，毕竟是对往事的回忆，难免会有记忆失实之处。其中有关“军宣队”的回忆，就是明显的错误。

浩然这部回忆录中有两处提到军宣队。一处是在写到1966年文革初期批判“三家村”时，他在县城给业余作者作报告，因不明底细，回答问题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揭发他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回到北京市文联后，“文联领导让我准备检查，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另一处提到军宣队，是在回忆到老舍之死的时候。那是1966年8月，即那个红卫兵狂飚骤起、北京全城陷于“红色恐怖”的“红八月”。8月23日下午，一车红卫兵来到北京市文联造反，拉出许多文化人批斗，浩然一眼瞧见了被斗人群中有作家老舍，“急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我到军宣队说明了情况，我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见该书278页）

浩然在这里采用“军宣队”这个名词，显然是用错了。

所谓军宣队，全称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出现的时间，并非在1966年的6月或8月，而是在两年之后的1968年7月底，这时，毛泽东决定把他曾倚重一时的“革命小将”红卫兵赶下文革历史舞台，下令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首都高校。当时说是派驻工宣队，实际上同时派驻了军宣队，统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时也分开称为工宣队、军宣队（实际上工宣队多半是在军宣队领导之下，如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就是由军宣队的迟群领导）。

那么，浩然所回忆到的文革初期驻北京市文联的“军宣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并不是军宣队，只不过同样是军人，使浩然产生了记忆误植。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就已对文化艺术界的“资本主义复辟”情况深为不满，并在1963年12月、1964年6月相继发出“两个批示”，对文化艺术部门作出了异常严厉的批评，文化部及文联各单位被迫“整风”，在文化部1964年整风中，几位抓具体工作的副部长齐燕铭、夏衍、陈荒煤、徐光霄、徐平羽等多次检查不能过关，此后齐、夏、陈被撤职。文化部部长茅盾被免职。正式免职之前，周恩来对茅盾说：“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又推崇资本主义文化。”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一）》，《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一期55页）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任命的文化部部长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任命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就有从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调来（任命前已到任）的萧望东中将（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和颜金生少将（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位军人，并以担任第一副部长的萧望东为书记建立起了文化部新党组（萧、颜两位将军都是临时脱下军装，文革中被打倒、复出之后又都回到了军队）。

当时为什么要调军人来领导文化人？只因那时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人问题太多而军人最革命。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解放军部队大力“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那一套极端革命的表清b深得毛泽东欢心，因而倚之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坚力量。这也许算得上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因为在他之前的马、恩、列、斯都从未有过用军人来领导文化人的先例。

随后，就有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审定并大加赞赏的《座谈纪要》，军人进一步介入文艺领域的“大革命”。后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她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指解放军），其实这“请尊神”并非江青的发明，发明权在毛泽东。

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那个文革“纲领性文件”《通知》之前，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已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而撤职、打倒，萧望东中将随即成为文化部代理部长。

1966年5月14日（“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之前），文化部召开20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由副部长颜金生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这充份表现出军人领

导的雷厉风行作风。

6月1日，即《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当天上午，文化部党组召开各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宣布解放军工作队将进驻各单位。

6月4日，文化部党组召开直属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宣布由萧望东、石西民、赵辛初、颜金生等组成文化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6月8日至12日，从驻京部队中抽调的解放军官兵组成的文化部工作队先遣组进驻文化部直属艺术院校。

6月14日，由上千名解放军官兵组成的文化部工作队开始陆续进驻文化部所属53个文艺单位。

6月15日，文化部党组召开工作队全体队员大会，萧望东作介绍文化部阶级斗争情况报告。

6月20日，文化部党组将《文化部为彻底乾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加上按语于26日批转全国。文件中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提出要派强大的工作队来文化部，对文艺队伍要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一书中称此报告“是江青、张春桥策划拟定的”（274页），显然不确。当时江青的手还伸不到文化部，更伸不到中共中央，此时在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而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是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陶铸（据当年造反派文章称此文件的中央批语就是陶铸所加），无论是刘、邓、陶还是主持文化部工作的萧望东，这时都不可能去听从江青和小小张春桥的“策划”。

7月9日，萧望东在文化部司局级以上干部及业务骨干（集中交待揭发“黑线”问题）集训班讲话中，称文化部问题太多（比之为解放前上海的四马路），部里的文化革命只能靠派来的解放军工作队。

7月18日，萧望东向从南京军区调来的解放军工作队人员介绍对文化部领导干部的政治“排队”（划分一、二、三、四类）情况。排出的“四类”（问题严重的）占了极大比例……

但是，这时毛泽东一反以往搞政治运动的惯例，突然决定撤销工作组，并对派工作组一事提出了严厉批评，表现出雷霆之怒。于是，继各大专院校工作组撤离之后，8月6日，文化部文革小组决定从各单位逐步撤出工作队，撤出前建立临时党委和院（团、社、厂）务委员会，并由领导提名成立革委会，工作队撤离后仍留驻个别“联络员”以“听取群众意见”。到8月16日，文化部所属单位工作队全部撤离，留下来的工作队成员改名为联络员，各口领导小组改名为各口办公室。此后

，文化部所属大多数单位原工作队负责人进入领导班子成为“代职干部”。

简要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文革初期进驻文化部及其所属单位的解放军工作队，其名称有过多次改变，若不是进行专门研究，谁也不会去关心它，更不可能去记住它。正是这个解放军“工作队”，或改名后的“联络员”、“办公室”、“代职干部”等等，在浩然记忆中混淆成了所谓“军宣队”。

浩然为什么会把文革初期的解放军工作队混同于后来的“军宣队”呢？除了当时名称上的演变难以把握和记忆外，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后来的工宣队、军宣队，实际上跟前边的工作组、工作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毛泽东一方面痛斥刘、邓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自己却大派工宣队、军宣队，还大赠“芒果”以示恩宠，公开宣称自己和林彪就是工宣队的“黑手”、“后台”，这一切，并不表明先前的工作组、工作队与后来的工宣队、军宣队真的有什么政治上或阶级上、路线上的区别，只不过一打一捧、一辱一宠都是为了其“伟大战略部署”的需要而已。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在1988年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就干脆将第八章的标题定为“新的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这是很有见地的。

~~~~~  
【往事追忆】

文革：洞派的回忆

• 江 南 •

转眼间，三十五年过去了，多少的世事沉浮；哭的，笑的，悲的，喜的，能在记忆中寻觅，真的不太多，较多的是在遗忘中丢失了，唯有青少年时以血与泪谱写的经历，却挥之不去，更不时午夜惊梦，重历其境，冷汗一场。就是那场“文化大革命”——起始于1966年的这场史无前例，惨无人道的人间大浩劫，一直牢牢地镶嵌在一生的记忆中，令我永世难忘。

至今在外国已生活了大半生，没有经历过四人帮覆亡后的喜悦，没有对经济改革有较深的体验，更没有在国内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下生活过。但在每次回乡探亲的短短日子里，从新闻，刊物，言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对金钱的态度，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等等，往往使我堕进隐忧的沉思，使我回想起文革的那段日子。现在国民和社会的演变，是好是坏，向好向坏，都犹如历史，源远流长，与以往分不□’7d,割不断。看到现今不少人们的觉悟和忏悔，努力将被掩盖歪曲的历史披露，内心的喜悦，实在是笔墨难描。历史将会证明毛泽东才是文革的罪魁祸首，只手永不能遮天，这个在十五岁时心中立下的信念，今天终于被证实。几十年来心中的悲郁，实在有不吐不快的冲动，希望在此给这苦海中倒进一杯，以戒后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我刚好十四岁。学校停课。整个校园，跟着是社会，没有其它任何的正常活动，就只有斗争，除了斗争，还是斗争。没有什么可斗的，也要找人，找事来斗。毛泽东说过，乱，是乱敌人。指的是搞乱刘少奇的阵脚。总之全国上下，里里外外越乱越好，越合他的心意。本来平静，友善，欢乐

的课班，因北京联动分子（最无人性的一群）在全国鼓起血统论的影响下，只有十四岁的娃娃们也将课室像切蛋糕般一分为三，红黑黄各一方，将所谓的黑七类同学统统赶在一边进行教训。向我们作出从北方来的训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并指出他们可以革命，即可以任意妄为，砸烂一切，摧毁一切，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就是不能乱说乱动。老鼠？我们只会打洞？他（她）们是龙？是凤？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恐怖与不忿。不少的同学马上失去了那股“革命热血”成了“洞中派”。乐得一个洞中观火斗。乱，让它乱敌人吧，这条“最高指示”倒十分有用。在整个“大革命”以至后期的上山下乡放置“垃圾”的运动中，洞中派的我们都在观察，思考，反问，探索，寻找，追求。以至在思想觉悟最高的时候，到了能灵活掌握，活学活用这条“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最高指示时，当权者说香港不好，广州好，对我们来说不就是广州不好，香港好吗。于是，觉醒了洞中派就陆续蜂涌而出，在敌人乱时，作出历史性，最后，不要命的决定——逃亡，向着那灯火灿烂，充满香风米气，起码有口饱饭吃，红男绿女笑盈盈的自由香港一次又一次地冲刺。失败了，再冲刺，又失败，又再冲刺，直到成功。然而，在此前，拼命的决心乃是来自“大革命运动”一步一步的培育，一下一下的锤炼。

运动开始后不久，校园操场上出现了几个一批，几个一堆被批斗的老师，全剃光了头蹲着晒太阳。时间一久，一个跟一个倒了下去，一次又一次被那些龙仔，凤女拳打脚踢打回蹲形，直至再也爬不起，无怨无声，目不忍睹。印象特深的是我的音乐老师，一个很有才华，年青的爱国归侨，平时与我们谈笑风生，天天早泳，身体十分健硕，只是由于他为人风趣、开朗，竟成了龙凤之的，吃沙饮尿，要尽各样把戏，直将他凌辱折磨到不像人形，至于身子留下了多少残疾，生命维持了多久，现在还不清楚。洞中派内心的恐惧连泪腺也给堵塞，每遇到此种情景，我唯有别过身，悄悄离开。我们洞中派的无言，无动，脸上带着的不忍，瞳孔里的惶然，不再围观，对那些正受着种种酷刑的老师相信已是一种安慰。

动乱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愚昧的凶残莫过于1967年捕打“逃亡劳改犯”。很多劳改犯逃了出来的流闻在全无通讯设备的落后状况下，靠咀巴的传送竟然也速度惊人，一下子整个广州城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恐怖中。一挨傍晚，每条街道都用各种各样的物品作成路障封锁起来，出入盘问，防止劳改犯流窜。但到底是否真有其事，还是毛派对离京的死敌进行赶尽杀绝，又一血淋淋的招数，至今仍是个谜。

一天，我路过另一间中学门口的传达室，见到一群龙凤在里面审问一个不像本地人的中年人，那人操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

“你从哪里来？” 一个龙仔发问。

“我从\*\*\*\*\*来的。”

“你说假话，你是从\*\*劳改场逃出来的。”

“什么场？不，不，我不是。”

“你他妈的说假话，操你奶奶！” 另一个龙仔一拳向那人脸上挥了过去。

“讲！你是不是劳改犯？”

“不，我不是。” 那人忍着疼痛，惶惶恐恐地回答。



“你不是？这么远跑来广州，干啥？还说不是，你妈的。”第三条龙贴身逼进，向着脸部连击两拳。血马上从嘴角与鼻孔流了出来。

“我…不是，”说话开始走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凤女不断高声喝叱。

“我坦白，我真不是劳改犯。”

“这叫坦白？你是找死！”新一轮拳头向着头部打去。

“你妈的找死！”一个龙仔用脚猛踢，另外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这人的肚子和胸部。

这时候，这人的脸型已经变了，脸上血糊糊的，血水和口水渗在一起，再也分不清。整个人蹲了下去。“我…不…是，我…不…是，我…不……”声音渐渐弱了下去，最后只是咕咙咕咙的喉音，不多久，整个身子软软的摊伏在地上，一切都静寂了下来。我又像往常，在骇怕中悄悄地离开。

“这个王八蛋装死，揍死他！”一个龙仔打破了死静。

“打死他！”

“打死他！”其它的一齐嚷了起来。

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又一阵像打沙包，又像打棉被似的沉闷声，我马上加快脚步，急忙离开了。第二天，在学校附近，公共汽车站旁边的电灯杆上挂上了此人的尸身，胸前挂了一个牌，写着：逃亡劳改犯。我不敢多看一眼，脑袋里面空空的，内心只是害怕，发毛。在那个时代，谁也不能，不敢，不准说这是不对的，残忍的。

疯狂的人们砸烂了一切，摧毁了一切；未疯的人在极度恐惧中噤若寒蝉，人人都只是盼望那些种种的不幸，千万不要临到己身。我们在“洞中”只能颤抖着观望。斗争，斗争，再斗争，从工厂斗到社会，从校园斗上街头，从口骂到手打，从文攻到武斗，整个社会卷进了血腥，乱的旋涡。最无谓的是斗进了家庭。夫妻反目，姐弟不和，你说你是革命，他说他是中坚，一个个本是和睦的家变成一个个扰扰攘攘，鸡犬不宁的小战场，有的还大打出手。最心痛的是有些傻瓜为了证明自己是彻底的革命者而出卖家人，告发所谓的反动言行，以致亲痛仇快，陷至亲于牢狱，或死于非命，比比皆是。当政者对外边世界所有一切的铁桶封锁，对思想的绝对控制，用枪杆子威迫下推行的封建愚民政策，对不同观点赶尽杀绝，做成了大部份人的愚昧，无知，麻木。连最基本的，明显的对与错，美与丑，真与假都不会去分，老毛说的就是对的，一句顶一万句。事实上，人们都不知道做的对他本身是为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时髦的“革命”的口号下过着的是禽兽不如，皇朝式的生活。回想起来真也该“谢谢”那些龙凤们，我们被打进洞后能够冷静，但也只能作一般理性的分析，在家中数说那些搞到家无宁日的傻瓜。我妈妈，一个全无丁点文化的老太太居然能像那个在街傍观看皇帝新衣的小孩，对我说，不要搞，搞来搞去到头来始终搞回自己。果然不久，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稍微幸运一些的我身处广州，临近港澳，人们不多不少都知道同胞的饼乾比本地的好吃，寄回的旧衣服总比只是深蓝和深绿的全国大同服漂亮。相比之下，普遍的南方人没有闭塞的北方人那么好勇斗

狠，在日后遭遇的苦难中，生命最终总算保存了下来。

有开场就必定有收场。当毛泽东的目的达到后，为了收拾残局，扫除社会“垃圾”，又一个漂亮的口号抛了出来，向着所有的大、中学生，不管是龙，是凤，是蛇，是鼠，提出“你们要继续革命，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炼。”索性实行一窝熟。至此，很多人开始梦醒，再没有什么派别争斗，因为到头来都同属一类，都变成了鸭，被赶到广阔天地里去。但仍有极少数中毛毒甚深的傻蛋，欢天喜地，迫不及待赶着去天天吃忆苦餐（野菜）。而我们大部份人却苦在心头，愁容满脸。有不少人尽量申请到近边境的县、乡、村落，但僧多粥少，名额有限。很少能如愿以偿可以一下农村就得到一贴日本膏药，脱苦海——偷渡到香港去也。而比较大量的人被安排到海南岛，一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贫瘠、炎热之岛，美称“宝岛”。

踏上“宝岛”时，我是十六岁。幼稚的我们心里仍存有一丝盼望，心想不用多久就可以像农忙期间，下去帮农民一段时期，然后回家。但岁月的残酷，时间的飞逝，了了无期，全无回家消息的等待，不到两年，希望完全幻灭。随着生命的成熟，青春的摧残，看到人生有如岛上的橡胶树，长成，榨取，老去，死亡，又像生产队里那头绉皮包骨的老牛在坑坑洼洼的山路拉完最后一车沉重的木头，流着泪，缓缓地倒地死去。细想一下，实际上我们连牛都不如。除了在火棘棘的太阳下辛劳，死亡，和它们有同一命运之外，每天劳苦了一日后，仍要天天晚上思想改造到半夜，承受那千遍一律，重重复复如和尚念经般的训导。有一段时间连星期天都被强迫做义务劳动，美曰“贡献”。人人都敢怒不敢言，只有靠第“三只脚”，挨着锄头，吃着卷烟，怠工偷懒，偷生养命。在这样的折磨下，什么革命理想，八九点钟的太阳，青年人的冲劲都烟消云散了。存在的只是一声声的哀叹与饮泣。在荒山野林中，人迹渺渺之处，我们不时狂愤高歌，不时回肠低吟，尽吐心中对现实之怨愤和反感。在叹息时，“老黑奴”的歌在草虫低鸣的黑夜里作心中的慰藉。

“快乐童年，早已一去不复返，  
身旁伴侣，（少时朋友），已经不在我身旁，  
他们已到那天上的乐园，  
我听见他们轻轻把我呼唤，  
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把我轻声呼唤。”

在悲愤时，向着崇山峻岭，向着天天陪伴默默无声的牛群，敞怀独自高歌欧洲大革命时的一首壮烈的歌曲。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  
愤怒的吼声，响彻了整个欧洲。  
我们为着平等，博爱，自由，  
愿付上宝贵的生命，  
……。

那时，霞雾般的共产主义像在云的一端嘲弄似的呼召，“干吧，努力地干吧，不久的将来一盘盘热腾腾的土豆烧牛肉，就各取其需了。”但暗地里有不少在红

旗下出生长大的人在毫无任何“反动”书籍，资讯的诱惑，影响下，深深地怀疑共产主义的真实性。在农村，全屋的墙上全贴满毛像的农民是革命的，早晚对着毛像三鞠躬的人是忠心的，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在烈日下唱着不清不白的忠字歌，一跛一拐跳着忠字舞，谓其忠心精神可嘉。高压下产生的愚昧，当政者太多，太大，太假，太空的口号，令到真正相信当政者们话语的人们只有九牛一毛。为了彻底弄清楚“共产主义理想”这个从出生就被灌输，要求要以毕生努力去实现理想，唯有从书本上寻找答案。在焚书坑儒的日子，找到一本书，像捡到金一样兴奋，除了毛选外，什么书都是珍贵的。辛辛苦苦找到了一些书籍，不料有个晚上，生产队长突然闯进来，二话不说，把所有的书统统没收。说什么除了马恩列斯毛的书，什么书都不能看。最后只有一条路，从寥寥无几，可以在书店买得到的马恩列斯的书去探讨。天天吃着萝卜干加椰菜，想着日后可能餐餐土豆烧牛肉，倒也能静下心来读了几个月他们的书籍。殊不知看了他们书再对比现实，发觉他们都在做梦，制造一个灭绝人性，可怕的美梦。在他们整个理论结构中，用物理、物质、机械性地理解、描绘、设计、实施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而对人及人性中的一切加以漠视、否认、抹杀、封杀。可以用最不人性的手段，机械地对人如对物质一样地处理，以达到制造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然后又像农场里喂猪一样各给所需。他们将人变成一个不准有自由思想的动物。有任何不同的思想也要强硬打压，强硬洗脑。终于，在无人性可言的理论下，所有进行的事情都是无人性的手段，结果必然是惨无人道。令我对此有这么大觉悟的，是斯大林的一节“理论”，他说当社会生产力到了相当强大，物质到了非常丰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就到来了。在人性里，当权者也好，平民也好，每个人都想吃好点，住好点，工作少点，都怕辛苦。无论怎样洗脑改造，除非全国每个工作地方有人用枪像监犯一样押着劳动，不然的话，三只脚（挨着锄头），借尿遁，慢条斯理地吞云驾雾（抽烟）等等磨洋工的法宝层出不穷。这样的“生产力”能强大到使物质各取所需？其次是各取所“需”，什么叫“需”？人的心很难满足，到了一人一架飞机时，人人又都想有宇宙飞船，人心无止境，如果有止境，又何必对生活有所追求，去追求共产理想社会。不如马上停步，饿不死的米饭加萝卜干也满足了不会死的基本需要。想到此，内心豁然开朗，他们的书籍也从此尘封。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一样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没有血性的社会群体，是老毛们最终，最大的骗术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其它的知青一样，思想逐渐成熟，觉悟。一个坚定，又亡命的决定在为数不少的青年人中产生了：逃，离开这个鬼地方，到香港去。

偷渡去香港，是我们的一个心愿，成了当时人们的主要话题。自70年开始，大规模的知青偷渡潮出现了。知青们冒着掉下深渊，被海水吞没，被鲨鱼咬噬的种种危险，分兵二路，一路直奔香港，一路借道澳门，再转香港，向那喷射着光芒，“沉睡的沙家浜”进发。知青们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在夜色的掩护下踏入漆黑，完全陌生的深山；在万籁俱寂的午夜，投进波涛汹涌，冰冷的大海。伴着我们的有一首悲伤的偷渡歌，倾尽了心中离别之情。在茅棚里昏暗的油灯下，在流涌的珠江堤岸旁，在树须低垂的树底，在临别绝不说再见的时候，我们哼着：

低头无语是岸边的榕树，  
悲声呜咽是奔腾的珠江，  
我不是不爱您美丽的故乡，  
我不是不爱您可爱的姑娘，

命运驱使我远走它乡，  
随着那江水流向远方。  
.....。

知青的命贱，我们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一但踏上了，就永不回头。不是成功到达，就意味着一生受凌辱，或死亡。当时大家互相勉励不要退却：“湿开了头，就一定要湿到脚。”（粤语）所以不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出击，宁死不缩。笔者也失败了两次后，才获得成功。失败后，监禁用的收容所（俗称格子），里面三教九流，弱肉强食，人生百态，应有尽有，是一所人性最彻底展露的人生大学。知青中可歌可泣的经历，宝贵的偷渡经验，也可以在这里听得到。其中有惋惜，有悲痛，有恐怖，有激愤，但都淌着辛酸的血泪。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听说有一对恋人，在被捕前的一刻双双跳崖。他俩遭到多次的失败，钱尽粮绝，送回农村后可能又被打又被斗，灰心丧志，最终选择了自杀，避免凌辱。逃亡中种种的恐怖与残忍事件，最冷血的一件发生在深圳边界。一个女知青被捉住，边防军仍继续放军犬咬，又玩又笑，直至一边乳房被咬去。在格子里面，我跟一个只穿着一条短球裤的知青交谈，他说他和另一个朋友在大鹏湾的大旋涡里进退不得，从午夜趴在车胎上泡到第二天下午，他们大喊大叫，漂浮了十六多个小时，边防军见他们始终淹不死，最后才把他们捉上来。这个人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在志气消沉的格子里，他详细生动地重述了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记，给了众人深深的鼓舞，要不屈不挠，坚毅地做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坚强的学者。

在格子里，人人都衣衫破烂，灰头垢脸，与粪尿共处一室，就地而卧，整个月都难得洗一次澡。“饿到你们脚软，要你们害怕。”这是格子的作用。在饥饿下，我们每次从地上爬起来，就像见到繁星满布的夜空，眼前一黑，金星四起，要马上蹲下，再慢慢站起来，待光回大地，才可开步。屙尿（小便）一定要扶墙，不然脚一软，难保不掉进尿桶。苦与贱是知青命的写照。有一天早晨，一个看守大发“善心”，将所有的人赶去操场，美言锻炼身体。我没醒过来，整个像剧场般的大室只剩下我一人还睡在地下，那个看守拿着一根竹子，离我稍微远点，用竹轻轻在背部打一下，我睁眼一看，整个跳起来，奔了出去。他呆了一呆，看我还是小孩的样子，没追上来。我后来想，他可能以为我死了，用根竹子探试，要不然用的力度肯定不止那样，让我逃过皮肉之苦。在操场上，我们排成一列列，每行列跑二十圈。已跌伤的，发烧生病的，被狗咬伤的，统统站在一列，不能跑吗，就原地蹲下，站起，做二十次。做不了，也得做，时间多得是。有一个人在行列中讲话开小差，听不到命令，那个看守拿起一把硬帮帮的竹扫，向着那还在讲话的人迎头飞过去，像以往一样，在不忍目睹的时候，我别转头，只听到一声惨叫。

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仰赖别人成功例子的鼓舞，对希望的信心，偷渡的知青们才能保持对生命仍有所留恋，有存在的勇气，有忍辱的能耐，有不断拼搏的精神，更有超乎常规的体能和体质。大家都知道当各人被押回原地（工作所在地），就要孤军作战，更要面对即将来临，不可预知的逼迫和更大的精神折磨。当我们这些烂命们回到宝岛，人们最好的“接待”也只能有如遇见爱滋病，人见人怕，避之则吉。当别人看见我们像大闸蟹，五花大绑，送去枪毙似的，不害怕才怪。如果不用挨打，不用像插米一样轮番批斗，那就是最大的祝福了。所以临别时，我们都会由衷地互道一句：香港见。寄望大家都千万不要再在格子相遇。

事隔多年，我想不少属于洞派的人达成了愿望，在香港，或在外国建立了幸福的家庭，热爱、珍惜这用血和泪，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幸福。想起那些葬身于波涛，跌死在山中不幸的男女知青，我能用任何的言语表达任何有助的感慨吗？我不能。我只能在此仅以本文对他们致以哀伤的悼念，悼念他（她）们在最悲惨的日子，以最悲惨的方式结束了苦难的生涯。观望那千万年来起伏不停的波涛，注视着永恒的时间长河，我能再多说些什么送给他（她）们，留给永远呢？

抹杀人的本性，消灭人的灵性，用物质决定一切作所有运作的真理，人自然就成了“高级动物”，唯物论造成了以往各时期种种人为的灾难。人死了，大不了死了些“高级动物”，虽高级，但仍是动物。弄死了，就一了万了。最终导致那些老毛们就可以任意妄为，违背天理良心，为了一己的权欲，物欲，特意推翻一切道德伦常，杀光一切异议的人士，把人当物，将人脑当电脑。用枪指着全国人民，不管愿不愿意，拼命输入毛的方程式（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人人说假话，因为这些话全是机械式的输入，实非其人本意。只不过蚁民要命不要脸，依样画葫芦，不得不说；而小人弄权者，则越说越多，越多越假。说起大话来，脸不红，心不跳这一文革硕果，虽经济改革已二十多年，但国民仍在品尝着，津津有味。

当今的物质至上，金钱挂帅，在社会的各种现象来看，是不是文革的另一个版本呢？以前为追求政治上的灿烂，现在为抢夺金钱上的光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两者都患上失却了道德的疯狂症。难道中国人的命运真的永远做物质的奴隶，停留在“高级动物”的水平上弱肉强食？将无穷的斗争，争斗，像文革所言，一代一代往下传？为免另一场不同方式出现的灾难，为免再当“傻瓜”，我们应该反省，离罪悔改。不可以忽视人是有人心的，人不是一种能制造工具，改变自然的高级动物，人的价值比我们能想像到的高出太多，就算穷一生之努力也难洞悉其中奥秘。所以在生命中需要有灵性，这灵性中有真光，能明亮心胸，明眸睛洁，这光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的本体——基督耶稣。

□ 脱稿于新西兰，威灵顿

∞ ∞ ∞ ∞ ∞ ∞ ∞ ∞ ∞ ∞ ∞

我见到了毛主席

• 田壮壮 •

采—采访者

田—田壮壮

采：你在毛接见红卫兵以前有幸见过他吗？

田：其实啊，天安门我以前就上去过，每年“十．一”上去观礼看焰火，跟父母去过，去过两三次，从来没想过往那城门楼子上看看说那毛在上面坐着没有，从来没有。那时候大人好像都很激动的，可是咱这孩子就是想玩儿那游戏呀什么的，想得一奖品回家，从来没想过去看看这毛。一直到了文革开始，说要看毛了，闹得挺热乎的，我才开始觉得挺想见见的。

采：你参加的是那一次毛见红卫兵？

田：“八·一八”那次。那天学校通知了，一起集合，早上五点多钟就骑着自行车儿奔天安门去了，车搁在半道儿，走到天安门广场里头，那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采：你在广场的位置是哪里？

田：我的位置……反正我待的那地方离天安门是比较远了，大概在广场西边，纪念碑和华灯之间，这位置我记得挺清楚。然后一直等着，不知道是等到几点，那个时候也没表，反正是太阳已经挺高了，已经等得很疲劳。其实我对伟人的接见呀或者是看到伟人呀，并不是一生中一种愿望，但是我觉得操，挺受那个感染的，那么多人，全是学生，一大片，天安门广场全满了，觉得挺有意思。

采：“八·一八”那天你是怎么见到毛主席的？

田：等到后来，突然间人头都“哗”地晃悠起来，就知道是来了，肯定毛主席来了。扬声器开始讲话，人都突然往一块儿压缩，往前挤，前头就喊：“别挤了！别挤了！”肯定是前头的人吃不住劲了，但是人还是往金水桥那儿拥，反正我就记得从人脑袋缝里头是看见主席了，穿一身青蓝色衣服，我感觉就像这牛仔裤这色儿，绝对是，还招手来着。

采：当时你周围的气氛你现在还记得清楚吗？

田：记得很清楚，狂热，很激动。

采：怎么个狂热法儿？

田：人哪，基本上嗓子都喊哑了，还有哭的，尤其是女学生……就说具体每一张脸你看不见了，那是一个气氛，就是说你不会具体说我看到谁是什么样，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你想我能把天安门集中到一个蓝点儿上，那注意力已经到了多集中的程度了，多大的视野啊，你只是觉得你在一种情绪和气氛里，根本没有具体的细节。

采：你当时做什么呢？

田：当时我还是挺激动的，口号我印象是没喊，因为我觉得我喊主席也听不着。我这人挺实际的你知道吧，我这忠诚他肯定听不见，太远了。还有，我会分一下神，提醒自己别把鞋给踩掉了，因为我有在天安门游行的经验，鞋很容易被踩掉，如果你哈腰儿去找，马上会被拱倒给踩死了，就是说我得留一个神，我操，别摔倒了，不能说“八·一八”回来人给没了。

采：后来呢？

田：后来城楼上的人下去了，底下广场的人也就散了，各奔东西，很乱，不像来的时候那么整齐。中午回家就跟我哥聊，我哥那天是搞纠察的，维持秩序、保护会场什么的，很靠前头，大概在金水桥那一带。我哥第一句话就问：“今天看见主席了吗？”我说看见了。我哥问：“主席穿的什么？”我说：“穿一身蓝衣服。”我哥说：“主席穿的是军装！”操……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招手的肯定是主席，穿那灰衣服那个。但是第二天报纸就登了照片，主席的确穿的是军装，我从报纸上也没有发现穿灰蓝衣服的是谁，肯定看的不是主席。操，我觉得特别扫兴啊！以后没过几天，我哥说主席又要接见了，可能要下来检阅，坐车绕一圈，让我跟他们学校去，说这次肯定能看见，我说我不去了，我看到的主席就是穿灰蓝衣服的那个，不管什么，我印象就是他了，反正我看到了。

采：你现在回忆你当初对毛主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田：我觉得我肯定没有别人那么狂热，原因就是文革一开始，父母被说成有问题的人，心理上有种下意识的排斥。

采：谈到毛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田：就是一个很受尊敬的领袖吧。其实我一直就没有什么特别神圣的感觉，包括对其他大人物，我记得以前北影厂在北戴河有一个疗养所，差不多每年我父母去都带着我们去，像周恩来、陈毅他们也带着孩子去玩儿，大人在一起玩麻将打扑克包饺子，小孩一块儿玩闹。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陈毅的孩子把郭沫若的孩子臭打一顿。反正，跟那些伟人们我就没有觉得特别神圣的。

采：“破四旧”开始时，你看到了些什么样的事？

田：听说有抄家就跑去看看，像隔壁院儿里，说有金条，一上午看扒房子，也没扒出来。又说哪儿揪出个地主婆来，觉得这地主婆肯定怎么怎么样，跑去看，也没什么，就一个老太太，总是看到的東西小于自己希望见到的东西，也都是些跟自己没关系的东西。

采：那个时候跟你有直接关系的事有没有呢？

田：最直接的就是我的父母被批斗，这是最直接的了。

采：当时的过程……

田：当时的过程嘛……一开始我在考虑家里会不会出事，因为学校校长打倒了，工厂厂长打倒了，我父亲是北影厂的厂长，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当时确实没有想得太理性，就想父亲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走资派。从感情上来讲，也有很侥幸的心理，觉得爸爸妈妈绝对不会有事儿，不会挨斗。

“八·一八”以后吧，这事儿就来了，来的挺突然的。那天是礼拜六，院儿里

来了几个红卫兵，都是北影厂的职工，搞照明的工人，也跟我们住一个院儿里。我看现在这几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当时就很正经儿、很严肃的样子，说要在我们院里召开一个斗争会，斗争四个人：有我父亲一个；崔嵬，他是导演；美工师秦威，现在还活着呢；还有海默，死掉了，是个编剧。你会在一种特别无意识里接受一个现实，你知道吧，我原想会有一个正式通知，然后会很热烈很火爆地来我们家抄一次家，然后说：你们家要封了，你现在是黑帮子弟了。但这事儿就随便定下的，弄得特别不庄重，你知道吧？我操，挺扫兴的，就突然间这么就算定了，说你爸爸有事儿了，要批斗，然后让我妈妈陪斗。

采：当时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

田：我现在想……我当时肯定有两种心理：一种呢，就是挺不情愿的，父母站在台上自己斗，这一定是不情愿的；可是又觉得这是一种……好像自己散漫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了件挺神圣的事儿，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是在那种神圣的革命之中，觉得好像有点儿要用我们这种感觉了。我操，就是阿Q的那种心理，绝对阿Q的心理，那么点儿小孩儿就有那种心理。而且，当时会上定的是我喊口号儿，就是说比别人还突出，别人只不过是坐一坐，而我是喊口号儿的。我觉这心理挺怪的，真是，现在你也说不清。反正那种不情愿又希望马上就要到明天的心理交织在一起。

采：抄家后来涉及到你家没有？

田：来了，接下去就是抄家，但对我们家还算客气，对海默和崔嵬家就特别粗暴，那海默也特别横，拿着这么粗的火通条，就冲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能进我的家，你们不是我们北影的红卫兵。就守着门口儿不让进。后来有人去劝，劝了半天，最后跟着红卫兵走了，被打死了。

采：家里被冲击后，你的同学或朋友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呢？

田：没有来往。我从那儿以后基本上不去学校，就在家裏，很少出门。反正吧，我从那个时候起产生的变化挺大的，从院儿里的孩子喊我第一声“狗崽子”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自己现在已经被弄到那一类里头去啦，觉得自己是不能说是革命组织成员之类的，父母的事儿吧，已经殃及到我了，就说我可以经常被别人随随便便地侮辱一下儿了，这文革啊，已经是跟自己有切身利益的事儿了。

采：好，我们的谈话回到现在，回到九二年你现在想起一九六六年，你觉得自己现在思想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田：六六年吧，我刚好十四岁，就像我刚刚跟你讲到的我们家的变化到我的一些变化，就是说，到了十四岁以后，你会突然发现那个童年是假的，大人们在一种很虚伪的生存中，给你营造了一个假的气氛。如果没有一个文革的话，我还会在这种很假的气氛里，一直不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的结构，还有互相间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也从来不会认真去想，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生存的那个环境太虚伪了。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家庭，还有我的学校和老师，没有人跟我讲过那些反面的东西，而是当他们自己不能保护自己，



也不能保护我的时候，才把这个现实给我，我只有接受这个现实，就一定要去想。

采：你现在是怎么想文革这场运动的？

田：其实吧，在想文革时我会更多地想到文革前，也就是“十七”年，从四九年到六六年，对这段时期我特别有兴趣，想了很长时间，我就想这个时期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翻身解放了，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正常地位的人了，可是翻开这十七年的历史，几乎没停止过一次运动，城市也好，农村也好，包括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没停过一次运动。从党内的，领导人之间的，像高岗、彭德怀，一系列政治的运动、内部的运动、领导权的运动；到下边老百姓，又有反右呀、“四清”呀这样的运动，普及到家家户户，一直没停过，所以到文革是一次集中的大爆发。

采：你的意思是文革不过是“十七年”的一种延续？

田：对。不过我不太想谈君主，也就是领导人的问题，这已经被谈得太多了，我是想谈“人民”这一部份。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吧，挺习惯被统治的，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这样，没人来统治你，没人来号召你做什么吧，就觉得挺无所适从的。每次运动来吧，人人都说这是上面布置下来的，没有一个人问过为什么，每次都是精神饱满的，全身心的投入。所以反过来想一下，每个人都有问题，不单单是领导人的问题，你作为人民的一员，你为什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就随着运动自然而然地进入又自然而然地结束，而真正从人的尊严、个性、社会的结构，没有人去认真地想过，包括自己和这个国家的位置到底协调不协调，是不是最佳状态，都不会去想。我觉得很奇怪，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运动，你说他麻木吧他又不麻木，每个运动他又很热情；你说他不麻木吧，为什么如此喜欢这样去接受东西。即使到了现在的改革时代，我对人们的状态也存在看法，从二十多年的拜神突然变成了拜金，从心理上、从核心上没有根本的变化，实际上还是在响应一种号召，无非是这种号召对你的个人问题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作用，现在的很多事儿我一点儿不觉得开心，反而觉得挺荒诞的。

采：你谈到的关于“十七年”到文革的想法，在你的电影里被体现过没有？

田：我的电影《蓝风筝》讲的就是这段时间的事儿。

采：拍这部电影，你最大的冲动是什么？

田：其实我就只是想把“十七年”的那种人的感觉记录下来。你还记得，咱俩儿上次聊，你问我：他们所有人都有疑问吗？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在运动中都有自己的痛苦和苦难，但不知怎么就给化解了，然后又信心百倍地投入到下一个运动中。我现在看我儿子看的那种动作片，就觉得如果这“十七年”和文革要延续下来的话，现在的中国人就跟机器人一样儿，脑子全抽空了，一个指令全都动起来，我觉得太他妈恐怖了！我觉得这种悲剧吧，不是纯领导人的问题，是每个人的悲剧。现在我唯一庆幸的是有好多的人，跟我同龄或比我小的都在思考我现在想到的问题，比如像你们这些人，尽管大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大家都在反省，这个特别重要。

采：这就是变化。在六六年的“八·一八”，你跟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一样，也是很想见到毛的。

田：那种气氛里，我操，完全像个大磁场，你在场也一样。不过说到底，我还是没有瞻仰上。

采：再后来你见过他吗？

田：到现在我也没见过毛是个什么样儿，只是在他死了以后，在纪念堂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事儿变得有点儿神圣了，那会儿各单位发票，党员优先，鄙人是党员，优先发了一张票，按理说给我一张票让我去看一个死人我是绝对不会去的。但我当时就觉得我得去看这个毛一眼，非得去看他一眼。从六六年到七六年，我十四岁到二十四岁，整整十年，对吧？可没少让我跟着他操心。那时候我已觉得自己挺理智了，我说我得去看看去，甭管是死是活看一眼就行，我就特认真地去瞻仰了一次。我跟你说我看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他也是一个人呀，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他怎么能把这国家折腾成这操性，我当时真觉得挺他妈的不理解的，我就想在那个人上面看出点道理来，我觉得没看出来，我觉得应该有一光环啊，就是冥冥之中应该有一光环，人家都是转一圈就出去了，我就一直站在那儿看，很从容地看，看了特别长时间，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是想发现点儿很奇异的东西，没有发现什么，最后还是不得要领。我这个看毛就以瞻仰遗体而告结束。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